

印度汉学研究的百年流变及 前景展望(1918—2018)*

章立明 周东亮

提 要 | 从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开设以东方学^①研究为导向的汉语课程至今,印度汉学研究已历经百年发展,其间交织着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移民潮、大国关系以及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虽然早期的印度汉研究与欧陆东方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因素使得印度汉学研究呈现出独特的走向与特点,而我们也可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 | 印度 汉学 汉语教学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 | K207.8

作者信息 | 章立明,1968年生,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650091。

周东亮,1976年生,硕士,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员,650091。

从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开设以东方学研究为导向的汉语课程至今,印度汉学研究已经历百年沧桑。虽然现在印度汉学研究(包括当代中国研究)仍无法与西方世界的同类成果相提并论,然而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因素也使得印度汉学研究有其独特的

走向与特点。虽然已有研究指出印度汉学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②,然而这种划分很容易切断研究内容之间的关联度,因此,我们选择以内容切入再配合相应的时间段来呈现印度汉学研究的百年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 本文系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2017sy10021)和云南大学2018年度重大培育项目(18YNUZDP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东方学是欧陆国家研究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文化的学科总称,包括中国学(汉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学、中东学、日本学以及印度学等类别。

② 参见(印度)坦卡哈(Brij Tankha):《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正在改变的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中国研究在印度:一条少有人走的路》,2009年,印度新德里,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7723079[2018-12-30]。尹锡南:《二十世纪以来印度中国研究的脉络和基本特征》,《南亚研究季刊》2011年第1期。章立明:《印度中国研究经历三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9日。(美)沈丹森(Tansen Sen):《中印研究的兴趣、发展与现状——沈丹森在复旦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14年5月19日。(美)谭中:《“现代玄奘”谭云山之子谭中教授口述中印关系史》,http://www.guancha.cn/tan-zhong/2013_05_08-143263.shtml[2016-10-22]。(印度)狄伯杰:《印度的中文和中国研究》,《汉学研究通讯》2014年第2期。

一、东方学范畴内的佛经抄本校勘与互译工作(1927—1959)

印度汉学脱胎于欧陆东方学^①,这从被金克木称为“汉学三博士”的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戈克雷(Vasudev V. Gokhale)和巴帕特(V. P. Bapat)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中即可得出结论。^②1921年12月22日,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创办印度国际大学^③,该校在开办之初就设有由沙司铎氏(Vidhushekhara Bhartacharya Shastri)任主任的汉学研究部,当时延请巴黎大学的列维(Sylvain Lévi)来担任讲授中国佛学的客座教授;1922—1923年间,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也曾短期到访过圣地尼克坦。泰戈尔说:“佛教是历史上中印文明亲属关系的灵魂,希望中国学院注重佛教研究。”^④因此,当1937年4月中国学院正式成立后,首任院长谭云山就决定把开设藏—梵和汉—梵相结合的佛学讲座和研究中印古代互动历史作为主要工作,特别是把汉文版佛经再回译为梵文作为中国学院的主要使命。

1. “汉学三博士”对汉(藏)梵语佛经抄本的校勘与注疏

师觉月的老师,无论是在圣地尼克坦时期的列维和图齐,还是巴黎大学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马伯乐(Heri Maspero)等人,大都是以收集不同语种的佛经抄本,然后对同一佛经的多语种抄本进行校勘与注释见长的东方学家。如列维法译《大乘庄严经论》,校勘《中边论颂》,注疏世亲的《唯识二十

论》、《唯识二十颂》以及安慧的《唯识论》等。师觉月的《中国佛教经典:译者与译品》(上下两册)、《两部梵汉词典:利言(梵语杂名)与义净(梵语与千字文)》、《释迦方志》、《撰集百缘经》及其中译本校注》等都属于传统东方学范畴内的研究成果。师觉月通晓汉语、日语、德语、法语、英语、梵语和印地语等,这使他成为印度最重要的东方学家之一,赢得了国际东方学界的高度认可和崇高声誉。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印度南方城市浦那的费尔古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成立了一个中国学研究中心,戈克雷和巴帕特曾在此地从事梵文、巴利文和汉文、藏文佛经典籍的比较研究工作。在金克木的协助下,戈克雷校勘了梵本《集论》,而巴帕特则用汉文与巴利文互译了《解脱道论》、《清净道论》和《善见律》,还对《佛说义足经》的汉语与梵语版本进行了对照研究。正如巴帕特所说的:“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合作,埋藏在西藏的大量印度古书写本就得见天日,而且不用很久就可以多知道一些(关于)印度古代的文化面貌了。”^⑤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文化研究项目,由师觉月出任项目主任,他们三人又齐聚中国学院,并共事多年。

2. 中国学院把汉(藏)文版佛经回译为梵文或巴利文版

谭云山在给中国学院设计课程大纲时,明确提出要开设汉文、梵文和藏文的佛学课,

^① 1814年12月,法兰西学院在欧洲首设“汉语、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简称汉学讲座),其中教习汉语就是一项重要任务。1840年法国教育部组建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并于1843年开设汉语课程,在其影响下俄国、荷兰、英国和德国也相继把汉语列入大学课程,而巴黎成为欧陆学界的汉学之都。

^② 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戈克雷(Vasudev V. Gokhale)和巴帕特(V. P. Bapat)分别在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是通过汉文(或藏文)佛典与梵文版对照来研究印度早期文化的杰出学者。金克木《天竺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60~68页。

^③ 校名取自梵语(Visva-Bharati),即一个使东西方精神交汇与交流的世界鸟巢,中译为印度国际大学。1951年,印度议会通过决议,将该大学由私立变为国立,由每届的印度总理兼任该校校长。

^④ (美)谭中、郁龙余主编《谭云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

^⑤ 金克木《天竺旧事》,1986年,第68页。

特别是要从汉文和藏文的著作中去重新寻找失传的梵文经典,把它们回译成为梵文版或者巴利文版。当时中国学院的汉文佛经主要有《龙藏》719函、7174册和《上海频伽藏》1916部、8416卷,而这些汉译佛经的梵文版大多已在印度佚失。辛哈(Narendra Krishna Sinha)说:“(谭云山)一生神圣梦想就是要把这些书都译回成梵文,这工作可能要几百年才能完成,因为圣地尼克坦中国学院收藏的佛经是如此浩繁。”^①由于当时在中国学院任教的学者大都通晓梵语、巴利语、印地语、英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再加上能够直接阅读汉文佛经,因此,这种以佛教研究为主的格局主导了印度汉学研究20余年,印度国际大学出版了中英文及其他语种的著作34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培养出了一批像巫白慧、法舫、巴宙和冉云华等为我国、锡兰、美国和加拿大佛教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专门人才。

然而由于翻译人员人手不足再加上经费紧张等,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院虽还有翻译成果陆续发表,但终因势单力薄,在几位译师谢世之后该项译经工作便宣告终止。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学界对于汉语佛经所持的轻视态度,这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学院佛经回译工作的深入。正如李志夫说的:“印度人认为佛教是印度人的,你们中国人来这里有什么好传的……不能自外于印度文化,所以,什么中国佛教、日本佛教,在印度学者们看起来都不是正统的,只是沦为中、日文化之一,而不被认为是真正的佛教。”^②也就是说,中国学院的汉文佛经梵化的回译工作本身并没有得到印度主流学界的接受和认可。

二、中印的互动关系与文化交流 (1937—2008)

20世纪30年代中印两国相继成立中印学会,^③从而建立起中印文化交流的长效机制,特别是中国学院还培养出了包括白春晖(Vasant V. Paranjpe)、南希珍(K. Vankata-

ramanan)、泰无量(Amitendranath Tagore)、慕克吉(P. Makherji)、苏季子(Sujit Mukherji)和谭中等一大批印度汉学家,其中精通汉语的白春晖曾出任过印度驻华大使。因此,除了以上提及的传统东方学成果外,更多的印度学者主要是通过历史材料和政治事件来解读中印关系在古代和现代的演化发展,包括最终提出“中印大同”这一标志性概念。

1. 中印之间历史与现代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印度和中国都先后遭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侵害,逐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一相似的遭际,无疑有助于拉近中印两个国家人民间的情感距离,而成立中印学会的目的就是在于,“中印两国人民,应急起联合,以图挽救,一面应急恢复两国过去之旧情谊,一面并须开创两国未来之新关系……如何联合?则在沟通中印两国文化始。如何沟通?则在研究中印两国学术始。”^④

作为关注中印历史互动关系的学者,师觉月先后出版了《印度与中国:一千多年的文化关系》和《中国—印度丛书》(共四部)等著作,其中《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1944)从汉文佛经中梳理出印度与中国千年的文化交流现象,以及中印两个国家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大改变,他说:“不求助中国如

^① (美)谭中:《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9页。

^② 《浮尘掠影:李志夫先生访谈录》,台北“国史馆”2013年,第97页。

^③ 1934年5月,印度的中印学会成立,由泰戈尔担任主席,其子担任秘书长,参会人员中不少人都在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中担任要职,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担任中印学会的名誉主席。1935年5月,中国的中印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当选为理事会主席,戴季陶当选为监事会主席。虽然这是中印两国间第一个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民间组织,但是与两国政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印学会具有半官方性质。

^④ 《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中印学会,1933年。

此热心保存给后代的文献,不仅是对佛教历史,就连印度文明史的各个方面都不能进行恰当地研究。”^①

当然,对中印互动关系的讨论并不限于圣地尼克坦一地,加尔各答的《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也开始刊登有关中印在古代与现代互动关系的文章;在瓦拉腊西印度教大学校长任上的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出版了《印度与中国》(1944)一书,此书在1947年和1954年又几度再版;1932年,拉古·维拉(Raghu Vira)在旁遮普邦创办了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专门研究印中关系史,他于1933年写成了《罗摩衍那在中国》一书,而其子罗凯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在主持该院工作以后,也整理与出版了多部与西藏历史、宗教和语言有关的藏文文献;曾经担任过首任驻华大使的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在《印度与中国的文化关系研究》(1957)一书中也探讨了中印两种文明之间的历史渊源。

中印关系正常化以后,对中印之间历史与现实互动关系的探讨就更加深入,如白蜜雅(Mira Sinha Bhattacharya)的《中国世界与印度》(2001),狄伯杰(B. R. Deepak)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2001)、《1904至2004年的印度与中国: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2005)、《中印关系:文明视角》(2012)和《印度与中国:外交策略及反应》(2016),以及玛妲玉(Madhavi Thampi)的《在中国的印度人:1800—1949》(2005)、《殖民主义世界的印度与中国》(2005)和《1943—1949年期间印度驻华使节对中国变动情势的观察》(2015)等,都选择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印关系的历史演变,并对如何加强中印之间的文化互信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 从中印文化交流到“中印大同”

1956年10月15日,谭云山回国访问时,在我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词中说:“中国与印度,不但是世界上两个文明最古老优秀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两个历史最悠

久长远的国家。打个比喻:我们中印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就好像我们两个国家中的喜马拉雅山一样……所以中国与印度,真是如我们古书所说‘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的国家。’^②这就是谭云山倡导的中印文化交流的核心所在,即联合中印,发展出一种以互识互补为目的的共有文化,从而达成中印文化大同的境界,这一思想就体现在其子谭中的一系列著述当中,如《中国与勇敢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1840—1842)》(1978)、《人鱼海神和龙:十九世纪中国与帝国主义》(1986)、《跨越喜马拉雅鸿沟》(1998)、《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1998)、《印度和中国:20世纪文明交流和震撼》(2006)、《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现实》(2007)、《谭云山》(2012)和《简明中国文明史》(2017)等。

当然,在印度还有不少学者也在其著作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考尔(T. N. Kaul)的《外交官回忆录1947—1999: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三角关系》(2000)和巴吉帕依(Kanti Bajpai)等人的《孔雀和龙:21世纪的印中关系》(2000)就认为中印同属的东方思维方式能让彼此更了解对方,关注中印两种文明的交流与传承历史,可以从中寻求到一种平衡和融通的地方,或者说用文化这条绳子能把中印文化两颗明珠串起来,进而构建起一种理想的文化状态。“中印大同”(Chindia)^③一词是由兰密施(Jairam Ramesh)在《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2005)一书中创造出来的,该词效仿中国古代的反切注音法,取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英文名称的

^① 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 p. 145.

^② (美)谭中、郁龙余主编《谭云山》,2012年,第212~213页。

^③ (印度)兰密施(Jairam Ramesh):《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蔡枫等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一部分组合而成,该词一经问世就引起印度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谭中也曾提出过“中印合璧”等观点,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英文单词,而兰密施创造的这个新词就成了对应“中印大同”的英文译名。

当然,沈丹森(Tansen Sen)等学者认为这一词汇无法为地缘政治中的中印关系研究提供实质性帮助,他说:“中印大同在表明支持中印团结,强调中印之间的文明互动(尤其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互动),或想象两国在未来的联盟,但对当前的地缘政治问题则避而不谈。”^①

三、在地缘政治与诸多领域中生长的当代中国研究(1962—2018)

1962年以后,认识中国和了解中国成为印度朝野上下的共识,除了将汉语教学纳入课程外,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还开设了有关中国研究的专业课程,在历史系和政治系的硕士课程中也增设了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专题,为印度汉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开创了一条“语言+专业”的道路。1988年,中印关系正常化以后,印度中国研究在从中国历史到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1. 以战略分析为导向的中国研究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中印关系并没有朝向‘地缘文明范式的理想发展,而受到‘地缘政治范式的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谭云山就不再可能继续领导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的大方向了”。^②在此后的20年间,有关中印边境冲突的成因、军事冲突过程以及印度北部安全环境的评估都成了印度中国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于是,印度中国研究开始出现轻中印关系、重地区战略,轻历史文化、重现实问题的倾向,当时最著名的中国通,不再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者,而是关注中印外交和战略关系的政府官员、专栏作家或者媒体记者。

除了学界外,印度从事中国研究的力量

还分布在外交界、军政界以及媒体等领域,研究者们大都通过不同学科以及各自经历来理解中印之间的冲突与争端,如律师努拉尼(A. G. Noorani)的《中印边界问题,1846—1947:历史与外交》(1967)、前情报局长穆利克(B. N. Mullik)的《在尼赫鲁身边的岁月》(1971)以及陆军中将考尔的《无法言说的故事》(1967)等。从1969年开始,新德里就活跃着一个由现任和退休外交官等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1990年,印度外交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CS)。

2. 在多个领域中生长的当代中国研究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掀开中印关系新的一页,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成为印度汉学研究的新引擎,以印度3所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为例,可见其研究内容涉及中国的文学、政治、社会、外交和宗教等诸多方面。如尼赫鲁大学邵葆丽(Sabaree Mitra)的《中国女性作家与性别话语(1976—1996)》和《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政治:问题与主旨》探讨了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作家群现象以及中国现当代的文化批评问题;墨普德(Priyadarshi Mukherjee)翻译和出版了《鲁迅诗集》、《中国当代诗歌集》、《艾青诗歌寓言集》以及《毛泽东诗词全集》等大量中国文化著作,2014年获得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狄伯杰利用中文资料出版《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2009)一书。印度国际大学的那济世(Arttrana Nayak)关注中国现代汉语的语法与句法研究;该校中国学院的杰姬(Jayeeta Ganguli)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常年能

^① (美)沈丹森(Tansen Sen):《中印研究的兴趣、发展与现状——沈丹森在复旦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14年5月19日。

^② (美)谭中、郁龙余主编《谭云山》,2102年,第111页。

为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长阿含经》翻译课程的教授。2018年,她因心肌梗死不幸去世。印度教大学的嘉玛希(Kamal Sheel)著有《农民社会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1989)一书;而专注中国佛教研究的劳吉(Lalji Shrivak)则与人合著了《丝绸之路上的印度》(2010)。

随着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自2003年以来,印度当代中国研究开始转向对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探讨,取代了之前地缘政治类的热门话题。^①当然,印度学界往往是把中印两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两两相对来进行比较研究的,如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的《印度与中国的草根民主:参与的权利》(2007)、塔伦·卡纳(Tarun Khanna)的《数十亿企业家:中国和印度是如何定位他们的将来和你们的》(2008)。古鲁斯瓦米等人的《追龙:印度能否赶超中国》(2010)重点探讨了两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联系及两种显著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取得成果的差异。乔杜里·巴尔(Raghav Bahl)的《超级大国?中国兔与印度龟的奇妙赛跑》(2010)预言未来将是美国鹰、中国兔和印度龟和平共存和神奇竞赛的时代。普拉纳布·巴丹(Pranab Bardhan)的《崛起的泥足巨人:剖析中国与印度经济崛起》(2013)在考察了两国的贫困状况、收入不平等和环境等问题后,剖析了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指出了两国面临的诸多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

印度当代中国研究人员包括智库专家、高校学者、政府高官、媒体记者和在国际机构担任首席顾问的资深从业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出色的海外教育背景,在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等领域拥有专业的经验。如兰密施是政府官员,穆利克和考尔属于前任军政大员;莫汉蒂、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纳拉亚南(Raviprasad Narayanan)、查克拉巴尔蒂(Sreemati Chakrabati)以及古鲁斯瓦米

(Mohan Guruswamy)等人是高校教授。

此外,印度当代中国研究亦深受一些身在欧美高校、智库甚至是华尔街的印裔学者的影响。如1998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库马·森(Amartya Kumar Sen)就是印裔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们当中既有了了解欧美也了解印度的,如塔伦·卡纳(Tarun Khanna)、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和巴丹等人,也有了解中国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沈丹森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印经济比较、外交策略、军事对抗或者是能源安全等主题的往往都能引起印度学界、智库以及媒体的强烈关注,如莫汉·马利克的《中国和印度:权力角逐者》(2011)和布拉马·切拉尼的《亚洲神像: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崛起》(2010)以及《水:亚洲的新战场》(2011)都是在“强邻必是对手”的思维模式下,一再渲染“中国威胁论”之作,虽然这一论调在欧美学界属于老生常谈,但是也不乏拥趸者。

四、印度汉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进入21世纪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印度汉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印度学界虽有重视当代中国研究的强烈意愿,但是不得不面临高层次汉语人才匮乏的现实。虽然从总体上说,印度关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大走向并没有改变,但是高级汉语人才的短缺必将加剧印度当代中国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国家汉办可以尝试进行印地语等大语种的教材开发,培训者培训(TOT)以及为国内的南亚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南亚中心/印度中心)搭建交流桥梁等替代性解决方案,等待中印两国整体社会环境发生根本性转变,印度汉学研究或将迎来自己的爆发式增长。

^① 章立明《印度当代中国研究关注经济崛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6日。

1. 高级汉语人才的短缺必将影响印度当代中国研究的水平

目前印度一共有 568 所大学,包括国立和私立在内的 22 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一般说的在印高校接受汉语学历教育的人数约为 2000 人。这是按照每校 100 人的在读学生规模估算出来的,其中还包含了预科班的人数,但是这些学生当中有近 50% 的人并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继续学习。如在 2013 年度,^①中国学院共有 112 名学生,其中预科班学生为 41 人。经过一年的语音学习和汉字的认读练习后,他们当中近一半人不能适应,只好转入其他专业,剩下的人升入本科一年级继续就读,在随后三年的本科学习中,还会有人因坚持不下去而退出,这从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每班人数维持在 12~15 人左右就可以看出。

汉语教学的学历教育最终培养的是三个层次的人才:本科毕业对应用通用汉语人才,可以从事导游、接待与一般交际场合适用的职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对应复合型汉语人才,能从事专业的文字翻译和高级别会议的口译工作;博士研究生毕业对应高级汉语人才,可以成为进行专业研究的汉学家(中国通)。近 20 年来印度高校中文系博士毕业生人数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如果说之前是因为中文系学生就业面窄而只好继续深造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因为就业门路拓宽后继续攻读博士就不是最优选择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印度汉学研究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储备不足问题。

在 2016 年召开的第九届印度中国学大会上,主办方说:“目前全印度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只有五六十人,但跨学科的学者人数有 10 倍之多。”^②但是我们知道印度中国问题研究者中不少人既不懂汉语而无法阅读第一手的中文材料,也没有接受过有关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方面的基本训练,只是单纯借助英文材料来解读中国社会,这已“造成印度当代中国研究难以在国际汉学界树一帜之言”^③的后果。

从以“汉学三博士”为代表的印度早期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既可以看出其深受欧陆东方学研究他者传统的影响,也能发现其关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特点,目的就在于借助不同语种的材料来认识印度文化自身。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印度汉学家对中印关系的走向出现了两极化看法,对此沈丹森敏锐地指出:“一些著述对中印关系的看法不是过于偏激,就是过于辩护。他们有的刻意植入推广中印友谊的观点,有的则为宣扬民族立场,而不带批判性地解读相关资料或事件。”^④现在印度高级汉语人才的短缺势必会造成进入印度汉学研究队伍的人数不足,进而影响印度中国研究的整体水平。

2. 国内南亚中心/印度中心在中印学者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在当前的大背景下,南亚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南亚中心/印度中心)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印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创造机会。

谭中说:“印度和中国要搭起一个桥梁的话,需要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作为根基……才容易搭起中印交流的桥梁。中印就是缺乏这样的桥梁,中国学者一方面不在印度,一方面没有 Empathy(移情作用),而使得桥梁形成不易。”^⑤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

^① 本文第一作者系 2012—2013 年云南大学派往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访问教授;第二作者同期也在中国学院从事院藏中文图书的编目工作。

^② 《印度中国学研究迎来快速发展期》,《人民日报》2016 年 12 月 16 日。

^③ 章立明《印度中国研究经历三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12 月 20 日。

^④ (美)沈丹森(Tansen Sen):《中印研究的兴趣、发展与现状——沈丹森在复旦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14 年 5 月 19 日。

^⑤ 谭中:《“现代玄奘”谭云山之子谭中教授口述中印关系史》,http://www.guancha.cn/tan-zhong/2013_05_08-143263.shtml。[2016-10-22]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的”季羨林先生曾撰写《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著作,他还走遍印度各地,向印度人民介绍中国文化,又把在印度的见闻和感受告诉中国人民,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领军人物。2008年,时任印度外交部部长的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代表印度总统辛格向季羨林授予印度最高荣誉“莲花奖”,就是为了感谢他“多年来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做出的成就,以及对于印中两国友好做出的巨大贡献”。^①

现在斯人已逝,国内的南亚中心/印度中心应该自觉地承担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角色,为增进两国学者之间的人文合作发挥桥梁作用。自1982年以来,全国各地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纷纷成立了南亚中心/印度中心,著名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南亚学会、南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的印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的南亚研究所以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印度中心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后起之秀的深圳大学的印度研究中心。自

1984年以来,深圳大学就先后开设了印度文学、中国印度文学比较、中国印度诗学比较、印度文化史、印度电影欣赏和印度文化概要等课程;2005年7月,该校印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08年11月,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正式开馆,时任印度驻华大使的拉奥琦(Nirupama Rao)和徐悲鸿之子徐庆平等人纷纷致电和题赠,被印度媒体称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大事件”;2011年12月,印度研究中心被确认为“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在,深圳大学的印度研究中心成为中印学术与文化交流、中印友谊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接待了众多印度著名学者、政要和各界人士来访,并主办了一系列重要学术会议及文化活动,如2011年的泰戈尔绘画作品展、2012年的第四届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坛、2014年的中国印度关系与世界新格局学术研讨会以及2018年的谭云山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等。

(责任编辑:高媛)

※

※

※

^① 《记印度外长向季羨林授予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新华网,2008-06-06, <http://news.163.com/08/0606/18/4DPAIO0000120GU.html>。[2018-09-25]